

啄木鸟文丛



鸣春集

于浩成

群众出版社

鸣 春 集

于 浩 成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鸣 春 集

于 浩 成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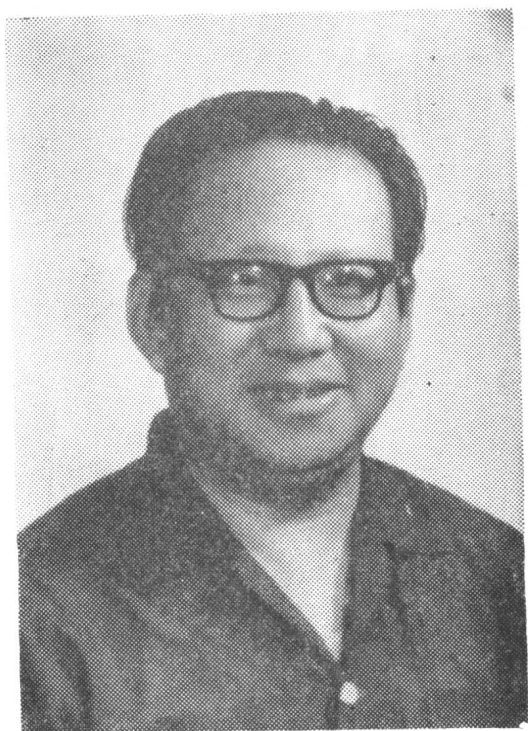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26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67 定价：1.20 元

印数：00001——3500册



作者近照

自序

我喜欢诗词，虽然读得并不多。一些小说里面为了叙事言情或人物刻划的需要而由作者自写或引用别人的诗词，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和警句。《红楼梦》里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不待言，就在《儒林外史》里偶尔也可读到有些诗词是很不错的。例如第九回里杨执中留给娄家两公子的那首七言绝句就颇有味道：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后来经人考证，这首诗的作者原来是元朝人吕仲实（见陶九成《辍耕录》）。原作也并非绝句，而是一首律诗，《儒林外史》选用的只是后半截，其前面还有四句是：

典却青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

瓶中有醋堪烧菜，囊底无钱莫买鱼。

这首诗虽有安贫乐道甚至孤芳自赏的气味，但不乏一个有操守的正派读书人耿介、正直、乐观主义的本色。这在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中已

经是难能可贵的了。特别是全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饱经忧患而终于熬过来了的过来人的自信和欣慰之情以及对于一片光明的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使几百年以后的人读了还发生共鸣。

我也可以说是半生忧患，大难不死的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精神感召下陆续写了一些杂文和评论。其中大部分已收入1983年8月出版的《新绿书屋笔谈》一书。从那时以后的一年多以来新写出的文章又有了不少篇，加上过去几年写出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发表或虽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未能收入《新绿书屋笔谈》的一些篇，现在编为一集。适值今年初有幸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亲聆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祝词，欢欣鼓舞，如浴春风。同志们一致欢呼！文艺界的春天到来了。想到自己这些年来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期待、催促、呼喊、歌唱春天之来临的，因此决定给这本小册子命名为《鸣春集》。从个人方面来说，不必讳言，也夹杂有上面引述过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的欣慰之情。

上面说过，书中有些篇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或虽已发表但未能收入《笔谈》书中的。说“由于种种原因”未免语焉不详，过于笼统。这里还可以略说几句。例如《话说啄木鸟》

一文，正好是由于里面谈到“而‘啄木鸟文学’，也就是不久前被一些人贬之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甚至谥之以‘缺德文学’恶名的，实际上恰恰是货真价实的，正而八经的‘歌德文学’。”因此不但使这篇文章在出书时未能“过关”，而且使1980年出版的《啄木鸟》丛刊只出一册便夭折了，直到1984年才得以改成16开大本重新问世并获得读者欢迎，印数高达180万册之多。而在张光年同志向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中终于为“伤痕文学”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他高度评价了“伤痕文学”在拨乱反正中的进步作用，指出：“所谓‘伤痕文学’，依我看，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遵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地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的文学。”

又如1981年7月到1982年3月由王若望同志《谈文艺的“无为而治”》一文引起的，我以“拙木”的笔名与亦木同志的一场论战，我在《立此存照》一文中曾讲过“争论的焦点在于党究竟怎样领导文艺工作才好。也就是我们要不要纠正‘文革’及其以前党领导文艺工作中的‘左’的一套作法，要不要在文艺领域中肃清过去‘左’的思想影响？”现在读了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我们党对文艺工作

的领导总的来说是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的是：第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偏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这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包括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关系不够正常，过分敏感，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的形势”。我认为不能不承认这篇祝词在事实上已经为那场论战做了确定不移的结论。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现在我把当时收集起来的论战双方的有关文字收入本书，也许并非多余的事情。

最近读到黄秋耘同志发表在《经济日报》（1985年2月14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庭草无人随意绿》。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庭草无人随意绿’。这句诗很有哲理，也很形象化。假如人们天天都在剪草、除草、铲草……甚至用穿上皮鞋的脚去践踏草地，草就长不起来，至少也不能长得苍翠欲滴，葱郁如茵，还不如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为好。但愿我国的经济建设，我国的文艺创作，都能早日进入‘庭草无人随意绿’

的境界。”他讲的很生动，很委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党对文艺不应干涉过多的大道理。读后使人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回头一看，我们在论战中的使用的语言，未免太过于剑拔弩张了。为了存真，书里也不便改动了。这是要请有关同志和广大读者鉴谅的。

此外还有几篇也是前几年不便发表的，如《再论宣传的限度》、《究竟是谁犯法》以及有关蒋爱珍杀人案件的评论等。这使我想到了：最近一些同志在文章中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所讲的话，绝不能说是毫无来由的。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当然，我在这里绝对没有以先知先觉自诩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政治民主和创作自由对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进步以及文艺创作的繁荣是多么重要。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认为替人民说话、呼喊，为民请命，正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满足于做别人的应声虫和留声机，那就大可不必写什么文章了。在桃李盛开的

时候歌唱春光明媚，固然很好，但我更喜欢在春寒料峭的时候那顶着寒风开放的迎春花以及“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的小松树。

承蒙著名画家钱君匋同志设计封面，并题写书名，使这本简陋的小书为之生色增辉，这里向他致以深切的谢意。

1985年2月17日

目 录

话说啄木鸟	(1)
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	(8)
关于“大义灭亲”	(13)
怎样才能写好政治读物?	(17)
“亡国之音”与“清谈误国”	(21)
有感于赵丹的遗文	(25)
旁听中的断想	(28)
批“衙内”就是搞株连吗?	(30)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35)
——关于个人阴私案件不应公开审理 与报道的问题	
再谈宣传的限度	(39)
文风不正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49)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55)
鲁迅与盲人文学家爱罗先珂	(58)
洗心与革面	(62)
附录:美国监狱里的整容手术	(64)
新论,还是老调?(拙木)	(66)
附录:抽象肯定与具体否定(亦木)	(72)
老调子还没有唱完(拙木)	(80)

附录1：也不过是老调重弹(亦木)···	(84)
附录2：也谈方法问题(亦木)·····	(93)
立此存照(拙木)·····	(96)
附录：拐了弯儿的争论(亦木)	
·····	(99)
《在被告席上》序·····	(105)
行路难·····	(108)
谈书店的一项改革·····	(111)
树校风之三愿·····	(114)
担负起建设精神文明的重任·····	(117)
一本不寻常的著述·····	(122)
读音写字与约定俗成·····	(124)
“放郑声”与“远佞人”·····	(127)
“三种人”和风马牛·····	(132)
多干多错与任劳任怨·····	(135)
司马徽并非好好先生·····	(139)
老舍先生为《我的前半生》改稿一事纪实	
·····	(143)
任亲与用贤·····	(148)
北京的今与昔·····	(152)
习惯与改革·····	(155)
造词有术·····	(160)
关于黄遵宪的《新嫁娘诗》·····	(163)
通俗文学漫谈·····	(168)
“向钱看”小议·····	(174)
附录：“向钱看”辨析(郝玉庆)	

.....	(177)
究竟是谁犯法？	(181)
多管闲事与少找麻烦	(187)
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	(191)
附录：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	(196)
诬害好人有罪，有理杀人同样有罪	(201)
——再评蒋爱珍杀人案件	
公正的判决与惨痛的教训	(206)
从创作自由到学术自由	(210)
江南的联想	(213)
也谈“影响”、“反映”之类	(217)
《红菱艳》观后	(223)
宁死不屈的黑人武士	(226)



话说啄木鸟

——记《啄木鸟》创刊的缘起和旨趣

“假使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在林彪、“四人帮”逞凶肆虐的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多少人背诵着雪莱和鲁迅上面的著名诗句，企盼着、迎接着黎明的到来。在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那一批丑类的历史性胜利以后，人民文艺冲破了现代迷信和极左路线的重重禁锢和枷锁，一个真正称得起万紫千红、百花竞艳的春天终于来临了。各种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文艺期刊、丛刊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

正是在这鸟语花香的大好春光中，编辑同志们临渊羡鱼，不禁手痒起来。“我们也出一份文学

丛刊吧，至少几十万公安干警会欢迎的！”“何止如此，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都会爱读的！”——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吵嚷一阵以后，出刊的事就算初步确定下来了。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是：用什么刊名？有人提出叫“前卫”，有人建议用“向阳”，但附议的人寥寥无几，有人甚至表示：刊物宁可不出，也不能再用那些只会使人生厌的，老掉牙的词藻来命名。大家搜索枯肠，继续寻觅。这一天毫无结果，连刊名都想不出，刊物势将难产。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一位同志忽然跑来说，他躺倒床上冥思苦想，猛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何不就叫“啄木鸟”？众人一听，无不拍手叫绝。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征稿、编辑过程中，一些同志在报章杂志上陆续读到不少关于啄木鸟的诗文。有的大学中文系同学办墙报也以此命名；有四个省市的漫画联展，名为“啄木鸟之歌”，有个科教片还专门以它作为主角，介绍了它护林除害的业绩……大家更加感到以这个灵巧可爱的小动物作为刊名，确实是十分适当，寓意深广的。

《文汇报》上发表的刘思平《益鸟自有护林功》一文中告诉我们，“啄木鸟的脚有四个足趾，前后两个分开，便于攀住树干，其尾羽坚硬如棘，在树上敲打凿孔时撑住树干就象坐在椅子上一样平衡，它的棱角形大嘴象一把凿子，能很快

将树干凿一个洞。与此配合的是一个长舌头，且尖端有倒钩，能将虫从树干深处钩出。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体结构，象天牛幼虫这种狡猾的害虫就难免作它的战利品。据调查，啄木鸟能啄食四个目、十五个科的二十一种树木害虫，真可谓是多科手术的好医生。”有的文章讲到啄木鸟在我国古代字书《尔雅》释鸟篇中被称为“鷲”，现代学名是*Picus richardsi*。前些年，孔子曾被批得体无完肤，好象这位“圣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正确的话，但我始终认为至少他劝士人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还是满不错的。老实讲，我以前对于啄木鸟所知甚少，这一次看到一点材料，真是获益不浅。记得鲁迅曾经奉劝学自然科学的人读点文学，学文科的人也读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可惜这样做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不少诗歌对啄木鸟一贯忠于职守，埋头苦干，扫荡害虫，卫护森林表示赞叹。例如，公木在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学墙报《啄木鸟》题词中写道：“剥剥复啄啄，羞作呢喃鸣。……所攻无不破，豸蠹难逃形。”《广州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刊载的黄河浪《啄木鸟》一诗写道：

“日日夜夜无休无穷
要啄尽一切寄生虫
让老树恢复生机
令幼木拔上高空
守护着满山葱茏

.....

感谢森林的忠诚卫士

欢呼除害的无名英雄”

《鸭绿江》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刊载的胡世宗
《啄木鸟的歌》一诗写道：

“用我心中的全部赤诚，

默默地做树的卫士，树的医生。

你听‘笃笃’，‘笃笃’……

那是我正在履行神圣的使命！”

读了这些美妙的诗句，我不禁想到，如果把
这些赞美之词移到忠心耿耿、日夜操劳的公安保
卫战士身上，不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吗？这些诗
篇，岂不就是公安保卫人员的赞歌吗？做到一个
主要刊登公安保卫工作题材的作品、反映公安保
卫战线上的生活和斗争的综合性文艺丛刊，以
《啄木鸟》做为自己的刊名，不是十分恰当、切
题的吗？

其实，以啄木鸟作为人民卫士的象征，肇锡
本刊以此嘉名，也含有自我勉励的意思，力求我
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无愧于人民卫士的光荣
称号。根据党的一贯教导，根据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教诲，一个真正的人民卫士必须立场坚
定，爱憎分明，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敌人无比仇
恨，为了人民利益能与敌人坚决斗争，直至献出
自己的生命，而绝不能有一丝一毫损害人民利